

吴杨波追忆怀念薛军先生： 凡胎与道心

吴杨波

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

接到编辑约稿的时候,车子正路过雾气缭绕的翠亨村。想起薛军曾经约我来这个背山面海的著名村子,去他的工作室转转。“没事骑个车子在村里转悠,安静,舒服,没人打扰!”这句话犹在耳边,我却一直没有去成——却猛然想起,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;这位兄弟,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小半年了。在记忆里,薛军的形象依然是那么鲜活,从来就不曾离开过。是的,是该写点什么,送给来世才能再相见的兄弟了。

薛军有着鲁智深的身段,惊人的饭量,时而正经、时而段子翻飞的肥厚嘴唇,还有那岭南闷热天气下经常一圈汗珠的光头。接触多了,发现他能有效地控制两百多斤的身体,绝非易事。多余的脂肪,贪恋碳水美食造成的打呼噜、不爱运动、出虚汗,成为薛军这个肉身凡胎标配的烦恼。然而他的烦恼还不止这些:这些年感情的连连受挫,才是硬核的折磨。待人以诚的薛军在姻缘的因果河中张开双臂,但怀中总是空空如也,只有刺骨的冰冷。听说最后是躺在爱人的怀里走的,也许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宽慰吧。

虽是肉身凡胎,但薛军为人做事却忠厚中正。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毕业后,薛军去了长沙某高校的美术系,过了几年快活的日子:黄昏和艺术家朋友们喝酒畅聊,深夜在画室,听着蔡琴《阿姐鼓》缥缈的歌声通宵达旦地画画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,他辞去教职,怀着对油画的热爱,南下来到广州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。但和那个时代所有中国油画家一样,他遇到了尴尬:学院派日积月累的写实功底,在以现当代艺术为主流的价值体系中难以立足。然而他是那样热爱写实绘画,享受画布上从无到有地创造的快乐,不甘就此投身到观念式的现当代艺术之中。于是他渐渐成为一个落寞者,一个只能在自己的画室里才能找回尊严的不合时宜的画家。因为形象过于显眼,这个时期的他经常出现在同龄朋友们的画中:蹒跚而迷茫,焦虑又犹豫,恰如那个时代青年们内心的共同写照。

在世纪之交,写实油画并非完全没有机会。观念绘画是西方资本和能源地产行业新贵的玩物,大众只是看个热闹而已;当精致写实的油画能够“甜蜜地欺骗眼睛”时,大多数国人还是很愿意享受这份惬意的。冷军、郭润文、徐芒耀等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在当代艺术的舆论场中无声无息,但民众还是默默用购买和支持投了票。薛军多年的坚持,终于在这个时间段有了成果。但他在追随前几位道路的同时,加入了对视觉文化的新理解,创造了一条“观念图像”的折衷道路。他笔下站在操场上的胖女孩,在阳光下笨拙地行走,无悲无喜。冷峻中透着一丝悲悯,一丝自嘲,一丝解脱,但很快被世俗的漠然冲散。画家自己也不说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,只是觉得很苦恼:虽然自成一格,但却不讨喜,被贴上了“写实油画的追随者”的标签。



薛军《志愿者》

后来,薛军的工作单位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调到了广州画院。对于这么一个痴迷画画的人来说,这是最好的岗位了。但很奇怪,他的新作数量不增反减。我隐约意识到,他遇到瓶颈期了。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和文化思潮的变化,当代艺术不再受欢迎,主题性绘画重新受到推崇。按道理来说,薛军应该这时天天泡在画室里,愉快地塑造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形象。可是接受过当代艺术观念洗礼的薛军发现:他无法绘制没有主观意志投射的图像。为了绘制十九世纪华工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历史题材创作,薛军请了模特,定制了服装和道具,考据了历史,甚至想去现场——只是因为各种条件不允许才作罢。他做了一切的准备,却无法解释:写实绘画,究竟是记录现实,还是再造历史?在这个过程中,画家的自我在哪里安放?没有答案,薛军手中的画笔于是日复一日地艰难起来。

后来听说他去中国美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,博士又延毕了。我们见面次数少了,但每次通电话总是说得很多。他说想从国美的“具象表现主义”中寻找突破口,重新找回绘画的意义。但“具表”的背后是胡塞尔的现象学,这可是被称为20世纪最艰涩的哲学。一位画家,在哲学的泥泞里艰难跋涉,其艰辛可想而知。等到毕业论文顺利答辩通过的时候,噩耗传来,他已经灯枯油尽,倒在求“道”的路上。

每每想起薛军,总是想起一起吃番禺猪杂粥、荔枝木烧鹅和炒粉的场景,席间那位高谈阔论、满脸油光的老友。但回想他几十年来的艺术与学术道路,却是一个求道者的心迹。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油画家,其实都是在西学、传统、现代、古典的夹缝中谋求一条自己的道路。然而走通的有几人?薛军释然了,而还在世的我辈,在清明时为他献朵花,然后继续前行。

王艾追忆林丰俗先生： 他的人格感染力 是对后辈最大的精神激励

王艾

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

中国画学院中国绘画研究中心主任

每逢春夏交替之际,总会让我想起林丰俗先生。不仅仅是清明时节的原因,更是因为在八年前的这个雨水纷纷的季节,林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当时我适逢博士毕业,一边写毕业论文,一边参与编辑林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作品集。在五月初画册终于完稿,随即送去让卧病在床的老先生过目,书稿看罢,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却是“博士毕业了吗?”实际上当时我还没参与答辩,但看着林老师关切的眼光,我只能说:“论文写完了,请老师放心。”一周后先生溘然仙逝。直到人生的最后阶段,林丰俗老师依然在关心我们这些后辈,这种传统师道的精神与传统长者的品德,使我至今难忘。

回想起最初认识林丰俗先生的时候,他退休隐居在市郊的心远草堂。对于潮汕出身的美术青年而言,林丰俗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。尤其于我这样从事中国画工作的晚进后学,更是自小耳熟能详的名字。但是第一次见到林丰俗老师,他亲切而朴实,一如我们每一个厝边巷口的潮汕长辈,毫无半点架子。林老师和他的夫人李燕冰女士,对于每一个上门拜访的年轻人都热情有加,不只是艺术上的指点与交流,包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亦是关怀备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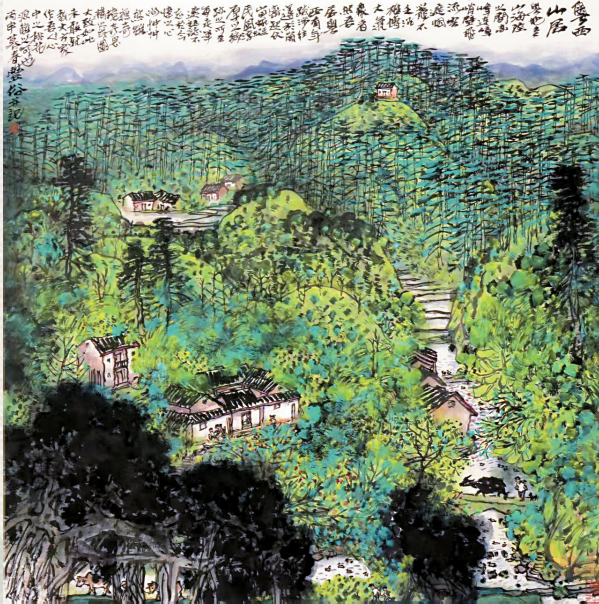
林丰俗老师爱读书,来往几次之后我们逐渐成为了书友。他通过我了解学界对于中国画有哪些新的论著,尤其是对于海外史学家对中国画的一系列论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陆续为林老师带去了高居翰、柯律格、乔迅、巫鸿、石守谦等各家著作,他读得很快,又很认真。有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去拜访林老师两三次,他读书的进度往往比我还快,讨论时我已经跟不上,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督促了我读书。他对石守谦《移动的桃花源:东亚世界中的山水画》一书兴趣颇大,和我有过几次关于“桃花源”意象的探讨,并笑言以后可以就此概念再作新画。天不假年,最后竟未能得见林老师为我们展开他心中的桃花源。林老师后来赠我一幅《粤西山居》,画中郁郁苍苍满眼绿意,是他早年在怀集所居之地。林老师说他成

家、生子皆在此地,题跋中最后一句曰:“作吾心中之桃花源解之可也”。也算某种意义上补了遗憾。

林老师关爱身边朋友后辈,甚于关心自己。有段时间我刚入职美院,又同时读博,压力甚大,身体不是很好经常生病。林老师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,第一句就问:“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好吗?”我总不胜惶恐而感激地说:“该我们年轻人关心您老人家才对。”对于一个离开家乡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,长辈的关心所带来的精神支撑莫大于此。我在林老师家聊天往往忘了时间流逝,经常被他二老留下来吃完饭。吃饭时林老师夹着虾说:“这个虾头嘌呤高,你尿酸高不要吃。”但是又嘿嘿一笑:“哎呀,虽然知道不健康,但是咱们穷人出身的,就觉得这个虾头最香。”临走时,林老师夫妇两人必定送我到门口大路边,目送我走到远方拐弯看不见人才回屋。很多去林老师家拜访的朋友都提到林老师这一点,是典型的老一辈礼仪做派。

尽管林丰俗其人其艺,在艺术界乃至美术史上有着特别大的影响力,甚至近几年来,关于林丰俗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切的热点。但是就我和林老师长久接触得来的感受,他给予我们最大的感悟,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凡人。对比起他的师长、他的同辈,林丰俗并不是一个“天才”类型的画家。我关注他的早期作品,在同类人中亦不属于特别拔尖和早慧的类型。但是在纷繁而动荡的20世纪,林丰俗的求学、修炼、自省的过程,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像你我一样平凡的人如何逐渐在苦难中成长,如何把握时代风气的转向,如何守住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,如何以退为进,最终达到一种特别超凡脱俗又俯拾皆是之平淡境界。这种人格的感染力与纯粹性,是对我们后辈最大的精神激励,也值得我们为此坚守。看啊,林老师他也就是一个普通人,他最后能修炼成这样的状态,而我们又还有什么理由对自己说不呢?

值此清明之际,回忆起这点点滴滴,仿佛林老师清癯而亲切的笑容就在眼前。



林丰俗《粤西山居》